

中国对“一带一路”出口的影响因素与策略选择

文/庞宇

摘要：在“一带一路”建设新格局下，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呈现出增长地区以东南亚国家为主、贸易方式以一般贸易为主、企业性质以国有企业为主等一系列新的特征。进一步实证考察影响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贸易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地区金融市场环境、出口市场规模、贸易成本大小、人力资本水平、外商直接投资持续流入等情况成为影响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的重要因素，为推动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未来政策需要在新市场和新产品开拓、地方经济特色发掘、出口结构优化、新型国际经济关系构建等方面有所侧重。

关键词：“一带一路”；出口；贸易；区域经济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138(2017)01-0023-07

当今世界正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并逐渐出现分化，国际投资贸易格局和多边投资贸易规划深刻调整。“一带一路”建设是在中国新常态发展阶段提出的新型政策，目前对于“一带一路”建设效应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本特征的研究还相对较少。其中一部分研究是从政治与外交角度考察“一带一路”建设，分析“一带一路”建设对地缘政治经济的重构和影响、经济外交的新发展等。^[1]另一部分学者则从宏观角度对“一带一路”建设进行了分析，探讨“一带一路”建设的整体经济逻辑、建设风险和策略等。^[2]此外，在对外贸易方面，部分学者探讨了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贸易的促进作用。^[3]

相对于以往研究，本文重点结合中国对外出口贸易的经济数据，从贸易的整体情况、市场分布、贸易方式、企业特征和地区分布等多个维度考察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贸易的特征。在此基础上，我们利用地区—国家—时间的三维面板数据，进一步就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贸易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并进一步考察了企业所有制的影响。希望通过特征考察和实证分析，能够为更好地促进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奠定理论和政策基础。

一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的分布特征

考虑到“一带一路”是一个开放的区域合作平台，尚未精确划分空间范围。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微观视角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的贸易效应研究”（14CJY001）；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带一路战略下北京出口企业市场进入与扩张的策略研究”（15JGC154）

作者简介：庞宇，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工商管理教研部讲师，博士，北京市，100044。

同时,结合数据的可得性,本文研究的范围主要包括了“一带一路”沿线的64个国家,其中亚洲43国,中东欧16国,独联体4国,非洲1国。

2002年以来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出口贸易持续增长,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出口贸易更是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2002年中国出口贸易总额为3255.69亿美元,其中向“一带一路”国家出口贸易额为50.24亿美元,占中国出口贸易总额的1.54%。2015年中国出口贸易总额为22765.7亿美元,其中对“一带一路”国家出口贸易额为6416.13亿美元,占出口贸易总额的27%。十几年的出口贸易增长,表明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的贸易联系已经变得越来越紧密。

(一)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的市场分布情况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涵盖亚洲、欧洲和非洲等国,经济条件差异巨大。中国不但在同一时期向这些国家的出口贸易状况存在着较大差异,在不同的时间,出口市场的动态分布也处于不断的调整之中。2000年,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出口最多的10个国家,其中排名前5名的国家是新加坡、俄罗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印度;而到了2015年,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出口贸易最多的国家排名中越南跃居第一,出口贸易额66.1亿美元,其次是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从出口较少的国家来看,2000年,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出口贸易额最少的国家是摩尔多瓦,只有6.7万美元;2015年,出口贸易额最少的国家则是不丹,贸易额尚不足十万美元。因此,结合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对外贸易联系紧密,贸易依赖程度逐年加深,中国出口市场也较为集中。这一点与近年来中国注重东南亚周边外交是密切相关的。当前,中国和东盟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东盟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

(二)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贸易方式和企业特征

从出口贸易方式来看,与中国向世界整体

的出口情况有所不同,2000—2013年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出口贸易方式主要是一般贸易,加工贸易所占比重相对较低。举例来说,2000年一般贸易的出口总额约为41.8亿美元,而加工贸易的出口总额11.3亿美元;到了2013年,一般贸易出口和加工贸易出口的出口差额进一步扩大,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一般贸易出口总额为294亿美元,加工贸易出口总额为161亿美元。考虑到加工贸易在出口中半壁江山的地位,在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中,加工贸易的比重还有很大的提升的空间。

同时,从出口企业的所有权性质来看,在2000—2013年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出口的企业性质中,国有企业一直是出口贸易的主要力量,而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在整个出口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则呈现逐步提升的趋势。2000年,国有企业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额为39亿美元,远远大于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份额。但在此之后,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特别是中外合资企业的出口稳步快速增长,逐步成长为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出口的重要力量。2013年中外合资企业出口贸易额达到114.8亿美元,而私营企业出口贸易额接近国有企业出口贸易额,达到139.7亿美元,国有企业、中外合作企业、私营企业三者分别占比为30.8%、25.2%、30.7%。可以看出,国有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和私营企业已经成为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的最为重要的力量。

(三)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的国内地区分布特征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贸易地区分布特征明显,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出口贸易额分别为16675亿美元、1570亿美元、1255亿元,所占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分别为86%、8%、6%。而从具体的省份分布来看,2013年中国各省份向“一带一路”国家出口贸易中,广东省出口贸易总额最高,约为5379亿美元,占全国贸易总额的27.65%;西藏自治区的出口贸易总额最低,为13亿美元,占全国贸易总额的0.07%。此外,根据2015年上半年31省份进出口统计数据,出口总额排名前10的省份是广东、江苏、上海、浙江、北京、山东、福建、天津、辽宁、重庆。

除了重庆是西部省份外,其他9省份均为东部省份。与总额排名相反,增幅前10名的省份分别是青海、贵州、河南、山西、广西、甘肃、湖南、海南、湖北、陕西,有一半是西部省份,中部地区较为平稳,其中河南增幅较大,东部除海南外,其余省份处在负增长区间。

二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的影响因素

在上文的分析中,我们讨论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贸易的特征。这些出口贸易特征的出现并不是自然形成,而是一个出口市场经济条件、贸易政策、企业所在地的制度人力环境以及国际经济形势变化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为了就能就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贸易的特征形成的原因进一步加以理解,同时能对未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扩张的推动力量加以分析,在这一部分,我们在上文就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贸易的一般特征进行讨论的基础上,着重采用实证分析的方式探讨当前中国各个省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的影响因素。

(一) 模型和数据

为了进一步就影响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的因素进行讨论,我们采用如下的模型形式进行实证分析:

$$Y_{ijt} = a + X\beta + \eta_i + v_j + \theta_t + \omega_{ijt} \quad (1)$$

其中, Y_{ijt} 表示的是第 i 个省份第 t 年向第 j 个国家的出口贸易额, η_i 、 v_j 和 θ_t 分别代表省份、国家和时间固定效应, ω_{ijt} 为误差扰动项。 X 为我们要讨论的影响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的主要因素,包括如下几个变量。

(1) 进口国国内生产总值:作为引力模型分析中的传统变量,进口国国内生产总值是促进出口贸易增长的重要的需求层面的因素。

(2) 双边地理距离:作为贸易成本的代理变量,双边地理距离的增加降低了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的可能。

(3) 多边阻力变量:由于双边贸易流量不但与贸易双方的距离有关,也与贸易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距离有关。^[4]因此,为了考察这样一种地理距离的第三方效应,我们在回归方程中引入

多重阻力项来进行讨论。参考 Brun 等的做法,^[5]第 j 个国家第 t 年的多重阻力的大小为 $R_{jt} = \sum_i w_{it} D_{ji}$, 其中 $i \neq j$, D_{ji} 为第 j 个国家和第 i 个国家之间的地理距离, $w_{it} = R_{it} / (\sum_i R_{it})$ 。 R_{it} 为第 i 个国家第 t 年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4) 地理毗邻哑变量:如果进口国与中国地理毗邻,取值为1,反之为0。

(5) 金融发展变量:参考 Beck 和 Berthou 的研究,^[6]当一国金融发展水平比较高时,一国的对外出口规模也相对较大。为了表征每个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我们以每个地区金融机构的全部金融资产占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加以表示。

(6) 总的出口贸易额:在存在出口的正向溢出效应的情况下,全国的总出口额的增加有利于降低每一个省份出口的不确定性,促进每一个省份的对外贸易。

(7) 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有利于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贸易竞争力继而带动出口贸易的增长,我们以每百万人口中的大学生人数来衡量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

(8) 外商直接投资:在存在外商直接投资的互补效应和示范效应的情况下,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有利于促进本地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水平。

出口贸易的数据来源于中国海关企业数据库,进口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地理距离变量来源于 CEPII 数据库,其余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样本总共包含31个省市、自治区向4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数据,样本时期跨度为2000—2013年。

(二) 结果及讨论

依次控制地区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和国家固定效应,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对回归方程加以估计的结果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大部分变量的符号和统计显著性在不同的回归方程中都较为一致,这说明了我们的回归分析结果的稳健性。

具体来说,进口国国内生产总值变量在统计上显著为正,说明随着进口国市场规模的扩大,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出口规模也在逐渐增加。

表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贸易的影响因素

	(2)	(3)	(4)
常数项	-12.93*** (0.336)	-12.90*** (0.345)	-1.457 (6.275)
进口国 GDP	0.0854*** (0.00363)	0.0879*** (0.00368)	0.0871*** (0.0319)
双边距离	-0.0355*** (0.00994)	-0.0212** (0.0100)	
多边阻力	0.426*** (0.0229)	0.422*** (0.0230)	0.547*** (0.071)
地理毗邻	0.225*** (0.0207)	0.219*** (0.0208)	
金融发展	0.428*** (0.0194)	0.426*** (0.0196)	0.447*** (0.0197)
总出口	0.103*** (0.00425)	0.123*** (0.00438)	0.132*** (0.00442)
人力资本	0.386*** (0.0149)	0.346*** (0.0150)	0.359*** (0.0151)
外商直接投资	0.0430*** (0.00184)	0.0420*** (0.00191)	0.0423*** (0.00193)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国家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R2	0.31	0.34	0.40
观测值	142,416	142,416	142,416

注：表中中小括号中数字为相应变量的稳健标准差。*、**和***分别代表变量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双边地理距离变量的符号为负数，并在统计上非常显著，而多边阻力和地理毗邻变量的系数在统计上显著为正，说明如果一国距离中国较近，或者与中国地理毗邻，而距离其他国家相对较远时，中国与这一国家的贸易量将会显著增加，这在论证了地理距离这一阻力变量的同时，也印证了国际贸易中第三方力量的存在。

而在供给层面，考察影响出口贸易的省际因素，我们又可以发现，在所有的回归方程中，金融发展变量、人力资本变量和外商直接投资变量的系数为正，并在统计上非常显著，说明随着一个地区金融市场环境的改善、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的持续流入，这一地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规模将会得到快速的提升。同时，由于总出口贸易变量的系数也在统计上显著为正，说明在中国省级出口贸

易扩张的过程中存在着非常明显的溢出效应和学习效应，每一个省份对外出口规模的扩张都离不开中国对外出口贸易的世界大国地位这一宏观背景。

(三) 进一步的分析：企业所有制的影响

在上文基准模型分析的基础上，接下来，我们引入对企业异质性的考虑，进一步分析不同所有制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影响因素的差异。具体分析时，我们将企业划分为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私有企业三类，分样本来进行回归分析，具体的回归分析结果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在我们将企业按照所有制的不同进行分组以后，我们得出的结论更为丰富。具体来说，就影响因素而言，对于所有企业而言，我们上文提到的影响因素在这一部分的分析中结果依然稳健，进口市场规模的提

表2 不同所有制企业出口贸易的影响因素

	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		私有企业	
	系数	稳健标准差	系数	稳健标准差	系数	稳健标准差
常数项	-5.861*** (0.229)	-16.81*** (4.989)	-5.437*** (0.292)	-27.13*** (5.805)	-12.22*** (0.193)	-4.996 (3.955)
进口国 GDP	0.0686*** (0.00261)	0.105*** (0.0321)	0.0241*** (0.00334)	0.109*** (0.0375)	0.0718*** (0.00215)	0.117*** (0.0148)
双边距离	-0.000466 (0.00742)		-0.0435*** (0.00953)		-0.0383*** (0.00618)	
多边阻力	0.424*** (0.0172)	0.744*** (0.0566)	0.171*** (0.0221)	1.591** (0.652)	0.317*** (0.0144)	1.166*** (0.045)
地理毗邻	0.167*** (0.0146)		0.238*** (0.0187)		0.215*** (0.0123)	
金融发展	0.0748*** (0.0132)	0.655*** (0.0151)	0.741*** (0.0180)	0.289*** (0.0201)	0.928*** (0.0106)	0.483** (0.0120)
总出口	0.139*** (0.00284)	0.0943*** (0.00436)	0.208*** (0.00380)	0.0826*** (0.00545)	0.129*** (0.00234)	0.113*** (0.00366)
人力资本	0.282*** (0.00897)	0.349*** (0.0128)	0.198*** (0.0112)	0.468*** (0.0169)	0.359*** (0.00726)	0.378*** (0.0101)
外商直接投资	0.0322** (0.00161)	0.00155 (0.00175)	0.0548*** (0.00201)	0.0592*** (0.00217)	0.131*** (0.0157)	0.121*** (0.0160)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国家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R2	0.29	0.30	0.26	0.31	0.36	0.37
观测值	42, 536	42, 536	50, 395	50, 395	41, 050	41, 050

注：表中小括号中数字为相应变量的稳健标准差。*、**和***分别代表变量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高、双边地理距离的下降、地理位置的毗邻、多边贸易阻力的提高、金融市场发育程度的完善、总出口规模的扩张、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都形成了中国不同地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的正向推动力量。这一点，与我们上文分析的结论是相一致的。不同之处在于，对于不同类型的企业而言，企业出口受这些因素影响的程度存在着一定水平的差异，突出的反映在如下几个层面：第一，进口市场规模、人力资本水平以及总出口规模对不同企业的影响差异不大；第二，包括双边距离在内的贸易成本的变动对于集体企业和私有企业的影响更为明显，说明这两类企业对于贸易成本的变动更为敏感；第三，相对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而言，金融市场环境的变化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动规模成为影响私有企业

出口贸易扩张的最为重要的因素，说明相对于国有和集体企业，私有出口企业由于相对困难的融资条件，信贷环境和融资条件的变化对私有出口企业的影响更为明显。

三 推动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的策略选择

从上文所分析的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特征和影响因素，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规模稳步扩张，同时也呈现出一些独有的特征。这其中，出口市场的相对集中、加工贸易占比较小、地区出口不够均衡是最为明显的特征。同时，在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贸易的因素中，出口市场规模、贸易成本大小、中国整体的出口地位、地区金融市场发展水平、

地区人力资本水平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都是重要的因素。同时,由于企业所有制的不同,这些因素对不同企业的影响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

为了进一步巩固和提高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未来的政策取向可以在以下几个层面有所侧重。

第一,注重开拓新市场,创新新产品。中国目前对于“一带一路”出口市场较为集中,要进一步加强与各个出口地的平衡协调发展,拓展向西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将经济大走廊辐射不断延伸,发展全方位对外经贸关系,在保持现有市场规模基础上继续开拓多元化新市场,加强出口广度与深度。进一步推进西北地区的铁路公路建设和西南地区的港口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中西部地区与国内外产品生产地和市场之间的联系。通过提高交通运输能力开拓向西的新市场,激活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能力。此外,虽然中国出口深度稳步提升,但贸易提升空间依然很大,除了新市场的开拓以外,新产品的引入也是重要的努力方向。这其中,创新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和决定国际分工的内因,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中,中国应该更加注重对新市场的开拓和对新产品的创新,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和技术水平,降低产品生产成本,提高出口企业竞争力和企业收益,想方设法扩大市场占有率。

第二,根据地方经济特色,发挥各地优势,加强出口贸易。要充分发挥各省(市、区)的区位、产业和文化等优势,明确各自优势与短板,为自身在沿线国家的交流交往中寻求最有力的定位和方向,寻求与相应国家合作的新支点,共同实现中国出口贸易的繁荣发展。中国西部地区自然资源蕴藏丰富,开发潜力巨大,通过“一带一路”建设,西部地区的产品不再仅仅通过广东和广西运往海外,而是可以寻求其他的出口通道。如成都开通了通往新疆和欧洲的货运列车,西部产能将通过铁路、公路等交通设施源源不断地运往中亚和欧洲,大大提高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西部区位优势日渐明显。与此相对应,中国东部地区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已经形成了贸易驱动型的外向型经济,在

“一带一路”出口中应深化转型升级和对外投资,加快企业产品结构升级,寻求与东南亚国家合作的新支点,开拓出口的新局面。

第三,要提升出口产品质量,优化产业结构。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中国在新常态经济大环境下应对增速放缓、增长乏力的重要战略举措。通过产业结构升级不但能够释放新一轮改革红利,发掘经济发展潜力,提高经济效率,同时还能够改变中国在国际价值链中长期处于的中下游位置,实现产业的上游浮动,获得更高的利润。因此,要加强与“一带一路”国家出口贸易,中国必须注重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出口竞争力。面对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周边国家,中国应该注重产品的差异性,提升技术含量,拓展产业链,提高附加值,建立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举例来说,新疆、广西等农产品出口较多的地区,盈利水平与农产品加工深度密切相关,应该改变生产模式,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充分利用地理条件和优势打造特色产品,提高农产品综合效益和出口竞争力。而对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来说,应该结合国内改革政策,调整升级产业结构,提高技术水平和产品附加值。此外,要加强服务业出口,推动边境旅游业、服务业的发展。在整体上提升出口的质量与竞争力。

最后,健全“一带一路”战略的相应机制,打造宽松自由的国际经济环境。在“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要注意处理国际政治关系,不仅是与沿线国家,更要应对来自世界各国的挑战和压力。一方面,要处理好与各国之间的关系,使外贸发展远离贸易壁垒是中国出口发展的重要部分。中国要积极推动各项规则机制制定,应对各种贸易保护主义,健全贸易摩擦应对机制,提高开放条件下出口企业应对外部危机的能力。同时,在“一带一路”战略下,加强“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建设,推动“一带一路”对外合作战略的重点实施,加快贸易通道建设,推动设施联通、互利共赢等,建设出口开放的新格局。另一方面,考虑到文化、体育以及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纽带作用,要积极打造中华文化品牌,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

体育交流,争取在重点国家和地区开展具有国际影响的对外文化体育交流活动。同时,要进一步加强与国际组织和“一带一路”国家的交流与合作,邀请更多重要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要员、国际名人来中国考察访问。同时,要充分发挥驻外大使馆、领事馆等对外政府平台的作用,构建企业对外出口信息平台的同时,积极宣传打造中国的正面形象。要注重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青年智库、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等的友好交流,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官方和民间的友好往来,全力构建友好和睦的国际交往环境。

注释:

[1] 李晓、李俊久:《“一带一路”与中国地缘政治经济战略的重构》,《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10期;黄益平:《中国经济外交新战略下的“一带一路”》,《国际经济评论》2015年第1期。

[2] 卢锋:《为什么是中国?——“一带一路”的经济逻辑》,《国际经济评论》2015年第3期;于津平、顾威:《“一带一路”建设的利益、风险与策略》,《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3] 孔庆峰:《“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便利

化水平测算与贸易潜力研究》,《国际贸易问题》2015年第12期;张晓静:《“一带一路”与中国出口贸易:基于贸易便利化视角》,《亚太经济》2015年第3期。

[4] J. Anderson, E.V. Wincoop, “Gravity with Gravitas: A Solution to the Border Puzzl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3, no.1 (2003), pp.170-192; E.K. Choi, J.Harrigan, “Specialization and the Volume of Trade: Do the Data Obey the Laws”, in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Trade*, Oxford;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8, pp.85-118.

[5] J.F. Brun, C. Carrere, P. Guillaumont, J.d. Melo, “Has Distance Died? Evidence from A Panel Gravity Model”,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vol.19, no.1 (2005), pp.99-120.

[6] T.Beck,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s There A Link?,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no.57 (2002), pp.107-131; T.Beck, “Financial 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11, no.2 (2003), pp.296-316; A.Berthou, “The Distorted Effect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on International Trade Flows”, *CEPII Working Paper*, no.2010-09 (2010).

责任编辑 马相东

(上接第16页)路”建设管理方面的困惑带来无限的希望。

注释:

[1] 习近平:《总结经验坚定信心扎实推进,让“一带一路”建设造福沿线各国人民》,《人民日报》2016年8月18日,第01版。

[2] 重大问题在联合国通过需要80%的赞成票,而美国一国最多时能拥有25%的投票权。

[3] 萧琛:《论中国资本市场“倒金字塔”结构的矫正——“简政放权”“草根创业”与股市供应面改善》,《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4] Paul Krugman, “China's Dollar Trap,” *New York Times*, April 2, 2009; 余永定:《见证失衡——双顺差、人民币汇率和美元陷阱》,《国际经济评论》

2010年第3期。

[5] 杨丽花、周丽萍、翁东玲:《丝路基金、PPP与“一带一路”建设——基于博弈论的视角》,《亚太经济》2016年第2期。

[6] “反四风”“八项规定”以来,五星级酒店申请降低到四星级,四星申请降三星,以此类推,一直是近些年的趋势。其目的是降低价格,以便旅客不再敬而远之。原因是公款消费已经变得非常严格。

[7] 萧琛:《去广义虚拟过度与“新常态经济”制度设计——返璞归真、清晰投入产出与振兴实体经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8] Will and Ariel Durant, *The Lessons of Histor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68.

责任编辑 马相东